

王
朝
柱
精
选
文
集

作家出版社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王朝柱精选文集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王朝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1

(王朝柱精选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6079 - 1

I. ①毛…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②周恩来 (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 史料
IV. ①A752 ②K827 = 7 ③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2986 号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作 者: 王朝柱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704 千

印 张: 44.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79 - 1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王朝柱，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史传类作品《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周恩来在上海》、《爱的旋律》、《女囚徒》、《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功臣与罪人》、《谍海奸雄》等，参与创作话剧剧本《决战淮海》，以及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邓小平》、《长征》、《张学良》、《延安颂》、《解放》、《辛亥革命》及电影剧本《龙云和蒋介石》等。《决战淮海》获全国优秀剧本奖，《李大钊》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东方杯奖，电影《长征》获华表奖和百花奖，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周恩来在上海》、《长征》、《延安颂》、《张学良》等获飞天奖、金鹰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六次获最佳编剧奖。

序

李硕儒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 23 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入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 72 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

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也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不小，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流向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蒙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接续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问。他倒并不反感，说他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他打成“反

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又已准备让他做院长赵沨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最终达到了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剧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街谈巷议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皇皇73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那时，“非毛”的声音不绝如缕，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也屡见不鲜，他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不能不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他又一次使我震惊了。不同于任何这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以个人经历个人所知的某战役某人物的回忆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大势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

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高层的纵横谋略及至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长征中，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也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观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我预感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完全会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传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保持毛泽东形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会有不菲的贡献。

果然，《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出版后，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与他切磋；当时主管影视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给他命题；军界领导周克玉和军内著名作家徐怀中对其创作关怀备至；那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广电部部长田聪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爱听他讲国共大事的来龙去脉，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长的身份关爱鼓励无以复加。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假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葱葱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忘却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逢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戏就是朝柱

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所以能如此，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着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其作品当更会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还有其他朋友对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称他为大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当听到作家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王朝柱选集》时，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众多编辑们的眼力、胸襟和作为。朝柱选集的出版，定会于史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族文化积累有益的一件大事。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说说我对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体悟，实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

目 录

上 卷

- 第一篇 / 2
- 第二篇 / 137
- 第三篇 / 251

下 卷

- 第四篇 / 376
- 第五篇 / 484
- 第六篇 / 640
- 尾 声 / 693
- 主要参考书目 / 697

上 卷

第一篇

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太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潜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发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

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趋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〇年，考取秀才。一九〇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既知道“围剿”红军的态

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共匪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共匪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

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